

“21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第九次国际学术研讨会，2016年12月8日-9日在珠海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与建设中的人文思想考略

——兼及对当代城市规划与建设的文化批判

马惠娣

(中国休闲文化研究中心)

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其中古代城市人文思想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古代城市规划理论与城市立法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十一世纪，在《周礼·冬官·考工记》中有详尽的辑录；而在《国语》中城市立法已系列形成；诸多先贤对城市建设与管理亦有精辟论述。至今，不仅留下了可见的，诸如，商都“殷墟”、西周洛邑、汉长安、隋唐长安与洛阳、宋汴京与临安、元大都、明清北京古城等众多城市遗迹或遗产，也留下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与建设中特有的人文思想。

本文拟以《考工记》、《管子》与《国语·齐语》城市规划理论与立法思想为考据，探索古人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中处理自然、社会、人、居所、审美之间关系的特征与原则，为当代中国城市化建设中的人居思想提供历史智慧。

一、古代城市人文思想考略

中国古代城市人文思想在《周礼》、《管子》、《商君书》及《国语》等政治、伦理和经史书中多有记述。

1、《考工记》

《考工记》是《周礼》中的一部分，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记述官营手工业各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为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之官书，内中保留有先秦大量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和工艺美术资料，记载了一系列的生产管理和营建制度，其中“匠人营国”为核心思想，描述了“匠人”营建理想都城的过程。

“匠人”蕴含着“士人传道”，“守土有责”的中国文化道统，要求营建者具备规划、设计、建设与管理等诸多方面的素养。“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考工记》）

这里的“匠”不是指一般的技术工作者，而是要有哲学家的思维与智慧，“仁以为己任”的胸怀与大度，实现人与地的“善其用、美其形、壮其势”，达到国

泰民安。这是大匠、巨匠，甚至是哲匠。¹

2、管仲

管仲（约公元前 723 年—公元前 645 年），被誉为“法家先驱”、中国文化道统的奠基人，主张改革与富国，为“圣人之师”。他对城市规划与建设亦大胆改革，提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上，必于广川之下，高勿近阜而用水足，低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适，就地利，故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管子》）。体现了古代城市规划中追求自然、天道的本质，也体现了对周制城市单一布局模式的变革，强调从城市功能出发，以理性思维和自然环境和谐为准则，对后世城市的规划建设影响深远。“民，乃城之本”；“城，所以盛民也”（东汉许慎）；“城为保民为之也”（《公羊传定公十二年》）。

3、《国语》

《国语》，又名《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记事。在《周制》中，对城市立法有这样的记述：“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国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御灾也。其余无非谷土，民无悬耜（SI），野无奥草。不夺农时，不蔑民工。有忧无匮，有逸无罢。国有班事，县有序民。”² 意思是说，种植行道树木标志里程，偏远地区要有旅舍餐饮供应。城郊要有牧场，边境要建迎宾客栈。洼地里要让野草丛生，城区里要分布树林和水池，以备防灾。大片土地都种粮食，使农民不会将农具悬挂闲置。衙役不可以耽误农务，不可以浪费人民劳力。国民优裕无匮乏。有休闲，无过劳。城府的基础设施井然有序，地方的力役供求得当。短短数语把城市立法中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劳作与休闲、城市与农村、工与农的和谐关系详述其中。

4、中国人居史

“人居”（human settlement）是指包括乡村、集镇、区域等在内的所有人类聚落及其环境。人居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人，包括个体的人和由人组成的社会；二是由自然的或人工的元素所组成的有形聚落及其周围环境……它是人类文化、人工自然物的载体，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主体、文化、技术通过人居得以实现。”³

当代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吴良镛⁴先生曾于 2014 年出版《中国人居史》一书，书中以近百万字的篇幅详实地记述和考证了从“源起与发轫——先秦”、“统一与奠基——秦汉”、“交融与创新——魏晋南北朝”、“成熟与辉煌——隋唐”、“变革与涌现——宋元”、“博大与充实——明清”，及“意匠与范型”和“转型

¹ 吴良镛著，《中国人居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 年，第 551 页

² 《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著作，记事时间起自西周中期，下迄春秋战国之交，前后约五百年。记录了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等诸侯国的历史。作者，左丘明，约公元前 502 年-约公元前 422 年。

³ 吴良镛著，《中国人居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 年，第 3 页。

⁴ 吴良镛，1922 年生人，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中国建筑学家、城乡规划学家和教育家，曾先后获得“世界人居奖”、国际建筑师协会“屈米奖”、“亚洲建筑师协会金奖”等。

与复兴”等九个部分，厘清中国人居发展过程中的特征与演进规律。为我们展现了中国古代人居建设与发展过程中，蕴藏的人居思想和相应的营造方法。的确，如吴良镛先生所说：“中国古人在建城过程中，不仅有思想、有实践，而且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遗存有丰富的‘原创理论’”。⁵

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一书中更强调中国古代城市的“营建制度”：“载有井田方格网系统规划方法……城内除宫廷区外，尚有庙社、官署、仓廩、市、手工作坊和闾里等功能分区。由于重视礼制规划制度，加之又采用经纬涂制道路布局，及井田格网系统规划方法，故城之规划结构整体性益强。”⁶ 实现这样的规划离不开“匠人”和“量人”。“匠人”是营城建国的职掌之人；“量人”负责测量事宜。他们分工协作、互相配合。这一措施，足见古代城市规划与建设在国家行政管理中所占的重要地位。⁷为人居环境奠定了坚实的规划基础。

二、 古代城市人文思想的多重含义

城市是人类文化与文明的创造物，除了确保百姓的安居乐业，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也始终保持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身体与心灵、劳作与闲适、都市与田园的平衡关系。“城市不仅是人类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创造的一个人工的环境，更是一种文化的载体和容器，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底蕴”⁸。

1，城市规划与建设中对自然的敬畏，即“天人一体”观。这不仅是城市建设的基本出发点，也表达了中国古人对生命哲学和生活智慧的认知。

古人从来不将自己的存在凌驾于自然之上。“天地之生殖资民之用”（《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天地者，万物之本”（董仲舒）。“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庄子·达生》）。因为“大地”播撒五谷、善待六畜，让人们丰衣足食；“天穹”则赐予阳光雨露、四季轮回，自然美景可以滋养人性、陶冶性情。与自然和谐相处乃民生与城市之本。故而，天、地、人合而为一——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之道在于“成万物”。因此，先民在建城市过程中“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周礼》），“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礼记·王制》）正可谓：“室屋众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处其室”（《管子·八观》），特别强调对自然的“节用”。

城市要让人与自然产生欢愉与共鸣，以此构筑自然环境、人伦关系与社会秩序。

2，城市与人的休闲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在中国文化史中，“休闲”二字有着特别的意义，一方面它是城市规划和建设的依据，另一方面，也是对人文思

⁵ 吴良镛著，《中国人居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8页

⁶ 贺业钜著，《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4版），第5-6页

⁷ 同上。

⁸ 单霁翔，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保护，《建筑创作》2005。

想的彰显：人倚木而休，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学会遵从自然规律。“闲”字，寓意生活的闲情逸致。闲字还引申为开阔、道德、法度，也有限制、约束之意。中国古人创造了独特的城市意境——山水、诗化、人居——亭台楼榭、名山大川、礼乐秩序、文化信仰。不难看出中国古人的城市理念与休闲要义的相互融通。

城市需要使人舒适、便捷、有序、自然；同样也需要从内在方面发展人、发展人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因此，游憩空间、公共绿地、休闲情趣、休闲服务、休闲设施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中从来都居于重要的位置。

3，天下人居五原则：“社会、生态、经济、技术、艺术”，是有序空间与宜居环境的目标，⁹（从单纯地房子拓展到人与社会；从单纯的物质构成到综合社会构成）。自秦汉以来，古人开始了大尺度人居环境空间的探索，诸如：“筑长城以保天下，修驰道以通天下，立岳渎以纲纪天下”¹⁰。尤以魏晋南北朝起，“士人”的文化艺术逐渐影响人居建设的方方面面，城市规划与建设融汇了园林、建筑、工艺美术、寺院等等，至唐宋，“书院山长，皆鸿博之儒；庠舍诸生，多俊彦之士”，可谓“社会充盈，人文泛彩，风雅不尽”，尽显城市的人文思想与精神色彩。

4，城，乃人之本也

古人的住宅：“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上有月，不亦快哉。”（林语堂）表达了人的生活品质与闲情逸致。这是城市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首先，精神与物质同在，上至都城，下至村寨，这是“天下人居”设计的灵魂。其次，仰观俯察与相土尝水，强调“整体环境”，比如，城市本身的形态、道路格局、建筑与自然山水、地形地貌的相容度等等。再次，人文点染与妙造成景，追求人文意蕴与优雅环境的融合，令人赏心悦目。人居离不开人的开拓与营造，但人居更离不开人文对人居环境的浸染，真乃是“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这其中包括自然之美、和谐社会之美、人伦秩序之美、文化遗迹之美、人文故事之美。有道是“城市的本质是人的生活”。

5，精神空间的营建

文化与审美是城市建设与规划中重要的依托和载体。自魏晋南北朝，中国士人的美学思想对城市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将诗情画意融入人居建设中，形成了诗化的人居环境与心驰神往的园林景观，使人居与山水交织在一起，营建了唯美的文化空间。

以盛唐和大宋两朝为例，“文人题咏”、“心灵呵护”十分盛行。一方面得益于国家一统、天下太平，另一方面文人雅士的精神活动助推了文化空间的营建。山水、城市、乡间、田园、市井遍布文人墨客的笔迹、颂词、诗文、匾额、楹联、阁楼等等，丰富了城市的人文内涵，滋养了黎民大众对文化精神生活的向往。保

⁹ 吴良镛著，《中国人居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3页

¹⁰ 吴良镛著，《中国人居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83页

存至今的黄鹤楼（武昌）、滕王阁（南昌）、岳阳楼（湖南岳阳）仍是人们仰慕人文山水的重要文化空间。

至宋代，由儒家的发展，将魏晋的“山林讲学”，演变至书院诞生¹¹。据统计“宋代书院有 397 所。另一说有 229 所”¹² 其中最为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茅山书院、石鼓书院、象山书院等等。当时的临安设有太学、宗学、武学最高学府，合称“三学”；还有算学、书学、医学、画学等专门学校，“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里巷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南宋·耐得翁《都城纪胜》）民间戏艺活动场所也满城皆是，供人们演杂剧、杂技、相扑、说书、讲史等，可谓昼夜不辍。

三、 古代城市人文思想的当代启示

德国哲学家施本格勒说：“人类是擅长制造城市的动物，人类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从城市产生的；世界史就是人类的城市时代史。”城市时代史的延续必然要求人文思想的复兴，这是城市发展的大趋势。

1、城市建设的五个维度。 不论如何定义城市，城市都离不开自然、人、社会、文化、民生这五个最基本的维度。

自然属性：有两层含义：首先是指自然形态的存在，即自然而然存在的天然自然。在这个世界上，凡是能够使人繁衍、居住、发展的地方，大自然都为人类做了合理的安排。表明了城市与自然的密切关系；其次，人是自然的组成部分，表明人必须尊崇自然、敬畏自然、遵循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城市是人创造的人工自然物，当，且应当与天然自然融为一体。

人文属性：人是大自然的造化物，是城市的主体和灵魂。由人延伸和衍生的城市环境、人居关系、衣食住行、艺术、游憩、贸易、市场、教化、秩序、睦邻友好，以及城市的文化遗存、历史、沿革、传说等等才使城市充满生机与灵性，城市才有了人文关怀的意蕴。城市因人而存在，城市中的一切人工创造物，如果脱离了人文，那么这个城市也只能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

社会属性：社会使聚集的人的个体联为一体，使人得以社会化，并在此过程中满足人所具有的社会属性的需要，为人区别于其他动物创造了条件。因而，合理的社会组织结构、畅通的社会运行系统、有效的社会管理机制、充分的社会交流渠道、健全的社会公共空间等等是一个健康、理性、人道的社会繁荣的基础。

文化属性：文化是自然、人、社会协调发展的果实，是城市最鲜明的符号，并以此铸造了城市的精神底蕴。城市文化的内核体现在城市居民的仁、义、礼、智、信的人格力量和文化素养等方面。还可以外化成教育制度、宗教仪式、创造能力、人性之善、信念与信仰等。城市文化的外部形态则体现在城市的建筑、雕

¹¹ 柳诒徵编著，《中国文化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¹² 陈元晖等，《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30页。

塑、美术、音乐、舞蹈、文学艺术、学校、教堂、图书馆、艺术馆、博物馆、自然遗产、文化遗产等外化物上，当然也包括人们从事各种生产的场所。

民生属性：

民生问题，在古代思想家的眼里为“天大之事”，尤以孟子多有论述，其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意即“百姓最为重要，国家其次，国君为轻”。孟子还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意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些思想对后世影响巨大。“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意思是说，祖先早有训诫，黎民百姓是用来亲近的，不能轻视与低看；黎民百姓才是国家的根基，根基牢固，国家才能安定。因此，“匠人营国”必是“士人传道”、“守土有责”、“人与天调然后天下之美生”。城市既要繁盛经济贸易，也要诗书礼仪；既要安居乐业，也要“耕者有其田”（孙中山）。“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庄子·天下》，成为中国古人建城之本。

2、城市既是富足的标志，也是文明与美的象征。城市之富足，不仅是物质丰裕，而且更重要的是城市中折射出的人文思想和精神，以及它带给人的美感——节奏感、时序感、礼仪感、协调感与审美感。

城市的节奏感。古代城市而非今日城市之概念。城市是“城”与“市”的组合词。“城”主要是为了防卫，并且用城墙等围起来的地域。《管子·度地》说“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市”则是指进行交易的场所，“日中为市”。“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合理与严谨的城市布局成为城市最原始的节奏形式。

城市的时序感。“二十四节气”展现了中国古代城市的文化时序。文化学者余世存认为“节气”是人在时间和自然空间中完成的使命、义务和人格成就，与中国人千百年间日常生活息息相关。¹³即使是高高在上的皇帝，每年也要在每一个节气来临之际祭拜“上苍”。这些仪式，使城市的时空张弛有度，百姓生活充实从容、日子轻松快乐，让人心中油然而生成对城市的敬畏感。

城市的礼仪感。中国文化传统中两张最亮的名片“礼仪之邦”、“尊师重教”，与注重城市文化空间建设相得益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以诗、礼、乐教化人格与品格的养成。“礼”、“乐”、“射”、“御”、“书”、“数”，使“六艺”成为人的生活中的必修课。“故君子之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礼记·学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真乃是“游，谓闲暇无事之为游，然则游者不迫遽之意”（郑玄注）。如若城市失礼或失序必定没了尊荣与威严。

¹³ 余世存著，《时间之书》，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6年

城市的协调感。“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卫民”（《吴越春秋》）。城以墙为界，有内城、外城的区别。内城叫城，外城叫郭。建城郭的目的是为了不受外敌侵犯；市井生活，“古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曰市井”（《世本·作篇》）。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城郭内部出现了不同的专业分工，比如有人专门从事手工业或手工艺，或商业，或从事农业等等。自然形成起来进行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的集市。城市时空有序，自然协调。协调可以产生效率、秩序，城市之美蕴含其中。乃同“风声与箫声，唱和如一，宫商协调，喁喁盈耳”是一个道理吧。

城市的审美感。体现在城市的完整性上，城与市的主体为人，为人的生活（物质的、精神的、审美的）提供足够的空间。“天人一体”让中国古人创造了大量的与自然相关的各种节庆。除“二十四节气”外，家族祭祀，修稷，隐士文化，“清谈”、女红、家学等等不仅用来指导农事，亦是农耕社会中辛勤劳作的人们用于愉悦身心、休养生息、顺其自然的生活准则。文人雅士吟花弄月而发展出诗意化的生活方式，更是老百姓对休闲生活价值的体悟。孔子说：“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驰而不张，文武弗为。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城市之美岂止在栽花种树，合理的休闲时空让城市保持一种张力，从内而产生城市之美才会悠扬、醇厚、绵长。

四、对中国现代城市的文化批判

事实上，早在七八十年前，中国城市建设与规划就已经失序和失范。

1、梁思成 70 年前的预言一语成谶

中国建筑规划大师梁思成先生在 20 世纪 40 年代出版的《中国建筑史》一书中对此现象曾做了精辟的描述与批判：

“近年来中国生活在剧烈的变化中趋向西化，社会对于中国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艺多加以普遍的摧残。虽然对于新输入之西方工艺的鉴别还没有标准，对于本国的旧工艺，已怀鄙弃厌恶心理。自“西式楼房”盛行于通商大埠以来，豪富商贾及中产之家无不深爱新异，以中国原有建筑为陈腐。他们虽不是蓄意将中国建筑完全毁灭，而在事实上，国内原有很精美的建筑物多被拙劣幼稚的，所谓西式楼房，或门面，取而代之。主要城市今日已拆改逾半，芜杂可哂，充满非艺术之建筑。纯中国式之秀美或壮伟的旧市容，或破坏无遗，或仅余大略，市民毫不可惜。雄峙已数百年的古建筑（Historical landmark），充沛艺术特殊趣味的街市（Local color），为一民族文化之显著表现者，亦常在“改善”的旗帜之下完全牺牲。近如去年甘肃某县为扩宽街道，“整顿”市容，本不需拆除无数刻工精美的特殊市屋门楼，而负责者竟悉数加以摧毁，便是一例。这与在战争炮火下被毁者同样令人伤心，国人多熟视无睹。盖这种破坏，三十余年来已成为习惯也。

市政上的发展，建筑物之新陈代谢本是不可免的事。但即在抗战之前，中国旧有建筑荒顿破坏之范围及速率，亦有甚于正常的趋势。这现象有三个明显的原因：一、在经济力量之凋敝，许多寺观衙署，已归官有者，地方任其自然倾圮，无力保护；二、在艺术标准之一时失掉指南，公私宅第园馆街楼，自西艺浸入后忽被轻视，拆毁剧烈；三、缺乏视建筑为文物遗产之认识，官民均少爱护旧建的热心。在此时期中，也许没有力量能及时阻挡这破坏旧建的狂潮。”¹⁴

在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有以梁思成、林徽因等一大批古城保护专家的不断谏言与据理力争，但绝大多数古城、老城仍被“改头换面”。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全国加剧了对老城区的改造。如北京胡同的消失。据文献记载，北京的胡同在清代发展到1800多条，民国时有1900多条。建政初期，统计有2550多条。1998年1月，地图出版社曾调查出，北京城里胡同还有990条。而到了世纪之交，平均每两天就差不多有一条胡同在城市改造的过程中消失。¹⁵

1972年，文革中受到批判的梁思成于贫病之中撒手人寰。他在生命弥留之际，总在重复这样的话：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¹⁶

梁思成的话一语成谶。如今，曾经将老北京城毁坏的政府官员们似乎意识到了错走的路，开始打算重修某些老建筑，如王府井、地安门、前门，但那还是遗产吗？

2、城市化中的跨越式发展

如今，更多的有识之士认为，近30余年的城市化建设，遍布大街小巷的“拆”字几乎掏空了北京城。中国人以为，现代化的全部力量在于一种扫除一切早先的东西的能力，从而达到一个全新的出发点，创造一个新的现实存在，创造一个新的奇迹。然而，这个新的现实存在和新的奇迹捣毁了我们曾经所熟知和拥有的一切。

当今中国城市千城一面、千篇一律、贪大求洋、复制雷同、资源不均，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双双沦陷：雾霾，道路拥堵，空气、土壤、水、食品均遭严重污染；而城市中的公共空间、公共生活、公共服务、游憩空间充斥着浓厚的商业气息，人文生态环境失序，处处被浮躁、功利、喧嚣、狡诈所覆盖。当然，不能不说，中国许多城市都是“高大上”、“白富美”，虽市容璀璨、车水马龙、繁花似锦、风流倜傥，却少有书院山长、庠舍诸生、鸿博之儒、俊彦之士。令人遗憾。

中国城市化建设如火如荼，660余座城市中有近200个城市定位于国际大都市。我们看到的却是“千城一面”中迅速崛起的CBD集群、高楼大厦灯红酒绿、

¹⁴ 梁思成著，《中国建筑史》（单行本），1945年。

¹⁵ 邓琮琮文：“梁思成和北京城墙”，2004年11月2日，见 www.aisixiang.com。

¹⁶ 邓琮琮文：“梁思成和北京城墙”，2004年11月2日，见 www.aisixiang.com。

拥堵不堪的街道，却缺少市民可及的休闲空间，诸如：图书馆、艺术馆、游憩空间、运动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错，但是不要模糊城市的价值取向，忘却人类建设城市的自我理想与追求。

近年来，国家出台政策鼓励建“特色小镇”，一批迅速打造的“养生小镇”、“养老小镇”、“创业小镇”等等各种名目的“小镇”如火如荼地展开。事实上，“特色”很难在短期形成，必须有历史深厚的积淀，否则违背了城镇发展的基本规律。然而为了“面子工程”、“政绩工程”、“任务工程”，那些“不懂城市为何物”的各级官员们一边盲目地跟风打造所谓的“特色小镇”，另一边却是将老宅院、老建筑、老品牌的東西都拆掉。此风必须煞住！

究其原因大致有六个方面：其一，现代城市在不断地扩大，原来城市的格局与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生活；其二，简单模仿西方现代建筑风格，近一百多年来已成惯习；其三，在不健全的市场体系下把城市推向了市场，将城市看作一件可经营的“商品”——或者当成经营者的“试验田”、开放商的“摇钱树”、当权者的“政绩工厂”；其四，近百多年来伴随文化传统的全面流失，产生崇洋媚外、民族虚无的思想；其五，传统价值观的颠倒与废除，将城市灵魂、品格与精神一并阉割；其六，主管城市规划建设的领导缺少基本的城市文化知识与修养，紧靠权力加号令。同时也缺少责任追究制。

3、城市与休闲的关系被忽略

人的休闲需求是城市发展的助推器，而休闲需求又得益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尤其在人们普遍富裕之后，人们对文化精神生活（欣赏高雅艺术、培养闲情逸致、多方面发展自我）、对广泛的社会交往的需求会变得日益活跃。无疑，公共生活与休闲空间是城市经济的新源泉。

我们注意到，在西方城市经济的良性循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的休闲需求的实现。诸如，在城市中河、湖、港口附近区域的商业开发、娱乐设施、餐饮服务、体育竞技，还有旅游观光、名胜古迹的开发利用，以及节假日和各类庆典场合的商业活动，各类非职业技能培训式的成人教育、众多高雅艺术的蓬勃发展，所有这一切无不把城市与休闲空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标志生活质量的各项指标中，其大部分内容同人的休闲生活有关（比如公园绿地、艺术场馆、社区宁静程度、自然环境状况等）。一个地区如果拥有并提供这些条件，对于日后的经济繁荣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无论是城市规划部门，还是政府或商家都把娱乐设施、商业网点、鲜花草坪和休闲服务看作是经济投资的一部分。

西方学者认为，休闲带动城市经济的发展，“是休闲而不是劳动使得工业资本主义走向成熟。”¹⁷

4、公共空间改造中的误区

¹⁷ 托马斯·古德尔著，成素梅等译：《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8页

的确，过去的几十年，公共空间改造一直是城市政策的轴心，政府标榜的是提高城市的宜居性，但实际上，在政府与房地产商人大肆的“越界”（transgressive）过程中，城市宜居体系遭到破坏，各种新矛盾和不公现象也接踵而至。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各个地方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在这个过程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城市由服务于人的宜居生活，而变为以商业化为主导——人的生活与劳作关系，以及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平衡被打乱，民众意愿与政府政策形成了对抗。整体上违背了1933年《雅典宪章》提出的：城市应当按照“居住、工作、游憩、交通”四个部分系统来有机构建的基本原则。

近一、二十年，一方面，各个城市为了发展旅游业，毁掉了许多古旧城市与街区，许多民居不得不让位于商业化的各种动机。那些不伦不类的高楼大厦、CBD、广场、步行街，看似带动了旅游消费、创造了就业岗位和新的产业形式，但是灯红酒绿的繁华背后却引发了各种矛盾和各种不平等。诸如，第一，地方政府、开发商与居民之间利益的不平等；第二，开发商的经济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不平等；第三，商业利益与城市文化发展长远利益的不平等。第四，过高的房价使相当多的平民陷入了艰难的生活窘境中等等。

同时，必须指出，城市正在“迪士尼化”（指一个原本真实的地方，其原生态的特质被千篇一律的景观所取代的过程，由西班牙彼得·K·法伦教授1991年提出），使原本舒适、熟悉的城市对原住民来说越来越不宜居。

结 语

中国古代城市人文思想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寄托着中国人热爱生活、追求审美情趣，向往美好生活家园（城市与乡村）的理想。当是中国城市文化研究史中不可或缺的方面。

如今，我们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提高经济效益，千方百计赚钱的同时，千万不要模糊“更好城市”的价值取向，忘却人类建设城市的自我理想与追求。不能让城市被领导者和商家玩弄于“股掌”之上，任凭其拍脑袋、独断专行；不能把城市当成“政绩工程”、“向上爬”的牺牲品；更不能搞城市大跃进。

如果城市让位于高楼大厦、遍地的汽车、杂乱无章的市容，那么怎么能有人和生活的空间；如果城市的休闲空间被过分地渲染为商业气氛，那么一定导致人性的贪婪与堕落；如果城市把当代与历史撕裂得血肉模糊，那么城市哪里还有未来！

城市的历史表明：一个恢宏的城市轮廓可以在短期内建造起来，但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品位、人文精神绝不能在短时期内显现。因此，城市发展不仅依靠货币资本的逻辑，更源自一种人文的内涵。

本文重点参考文献:

- 【1】 吴良镛著,《中国人居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年
- 【2】 贺业钜著,《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四版
- 【3】 马惠娣主编,“宜居城市与休闲空间——人文学者视域中的城市与休闲”
《中国休闲研究 2015》,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联系方式:

马惠娣: mahuidi@china.com

电 话: 15611714462

网 址: www.chineseleisure.org

完稿于 2017 年 3 月 18 日